



一把尺子 衡量境界的高低

问我们：你活得满足吗？

□河南日报记者 朱夏炎 王钢
(上接A11版)

转业

以后解放台湾就交给你们了！少尉李文祥向军营敬了最后一个军礼。

1956年8月,32岁的他复员转业为18级干部,到福建省三明市,在福建省建设厅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保卫科担任保卫干事。

在自己曾经打过仗的这片土地上,他又投入了火热的地方建设。他不愿坐办公室,一线哪儿艰苦就去哪儿,先后在厦门营房、永安营房、莆田营房、南安营房、仙游制糖厂、漳州营房等工地保卫安全。到龙岩,领导让他当电厂厂长,他觉得自己文化低谢绝了。最后在三明钢铁厂工地待得最久,住了一年多,可正逢国家经济困难,工程下马,担任三外队长的他就领着工人开荒种菜渡难关。

那个年代,转业军官受人倾慕。据陈宝珍回忆,当时南安一带有200多名转业军官找对象,都是三四十岁年纪,“福建姑娘没少被他们娶去”。英俊精干的李文祥当然也有不少人介绍对象,女教师、女医生,他看看都没看中,怕文化人跟他过不去。他想,只要思想进步,能吃苦过日子,就是庄稼人也可。河南老家寄来一张扎俩小辫儿的姑娘照片,催他回去结婚。

转业第二年,李文祥在南安梅山镇营房工地时,陈宝珍正在营区给人当保姆,镇里保卫干事介绍两人相亲。这个农村姑娘的身世触动了李文祥,他5岁没娘,她1岁没娘,不由惻隐相怜,而且她能吃苦,虽然瘦小,却18岁就挑118斤稻谷翻山走8里路去交公粮,所以见第一面便心中暗许。第二天李文祥去了仙游工地,在那里偶患胃病,单位战友写信催陈宝珍过去。陈宝珍已没母亲,父亲下南洋去泰国断了音信,就由表哥送嫁到了仙游。花20元钱,炒几个小菜招待一下单位领导,就结了婚。

陈宝珍婚后在公司幼儿园当老师,在建筑工地帮工。虽然夫妻聚少离多,还经常搬家,但那是她一生最幸福的6年。在发黄的老照片上,妻子穿着苏联流行风格的布拉吉,依偎在英武的丈夫身边,笑得多么甜蜜!

1962年,上级来作报告,国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,农业歉收,号召干部精简下放支农。从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一下子变成种地的农民?在绝大多数人看来,这是一落千丈的沉沦。但是,李文祥仍像当年冲锋陷阵一样率先报名了:“共产党员应该听从国家号召,群众饿肚子,干部有责任!”因为他是革命功臣,担心领导不批,他又当场咬破手指,在申请书上按了血指印。那时食品极其匮乏,公司经理拿出公家还未养大的小鱼、鸭蛋为他饯行,有人提意见,经理勃然怒斥:“老李过去打仗流血,现在带头支农,你都没看见,吃点小鱼和鸭蛋你看见了?”

记者问陈宝珍:不当干部当农民,这么大的事你都依了丈夫?

她朗声说:他的主意,我起初不知道,后来知道了有啥办法!

一旁有人说:你们家是老李说了算吧。

她边朝厨房走边笑道:今天晚上吃啥饭,还是我说了算!

1962年夏天,由李文祥带队,十五六个精简支农的人踏上茫茫征途。当时福建海防局势紧张,大小火车站都不售票,但还是照顾他们上了部队家属车厢。到山东济南时,李文祥夫妇下了车,然后经聊城回河南范县。

归心似箭的李文祥,凭介绍信在聊城汽车站买了回范县的车票。这时两位范县老乡诉苦,说等几天了买不到车票回家。以李文祥的性情,二话不说就把车票让给了素不相识的乡亲。可当他自己坐上汽车时,风雨交加,车至莘县走不通了,夫妇俩在车上又冷又饿坐了一夜。从莘县到范县只好步行,背扛行李跋涉18里路,在白衣阁村头第一个遇到了麻五哥。

全村老少见李文祥夫妇突然带着家当回来,惊喜地围上前,问他们走不走了?他说不走了。

此时他离家已21年。出去当兵杳无音信,父亲曾以为大儿子已死在外面。刚解放不久,忽然敲锣打鼓吹喇叭,区武装部把他的立功喜报送上家门,家里从此享受军属待遇。父亲给他去信,他才知道了家里的情况。转业后他探过一次家,这一次却是彻底回乡扎根了。

生产队给了3分自留地,30斤麦子,日子从头开始。

李文祥十分明白,所有的国家干部待遇,瞬间已经全部失去,今后指望种田吃饭了。

下篇

李文祥的人生分为两半——前面15年的从军和转业,如一阵鼓乐的“急急风”;后面50年的回乡务农,如一段音乐的“慢板”。

前半半雄壮火爆,奇异卓著,高潮迭起;后半半平凡淡泊,沉潜缓慢,波澜不惊。前后如同峰谷,前半有多高,后半就有多深;前半有多奇崛,后半就有多沉寂……然而,静难于动,忍难于纵,更加难能可贵是后半,更显高风亮节是后半,更见功夫是后半,更打动人是后半。人生在强烈反差中达到完整、平衡、高尚、伟大,前半生是英雄,后半生也是英雄。

一把尺子 衡量境界的高低

问我们：你活得满足吗？

“儿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贫。”

下乡支农有许多去向,李文祥唯一选择了河南老家。他明明知道老家很穷。

位于河南省东北角的范县,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。正处在黄河故道“豆腐腰”上的它,主要穷在水患,河床滚动无常,涝灾频仍,土虚田瘦人贫。白衣阁乡又坐落在滞洪区内,为了调节分洪长期做着无私奉献。

近4000口人的白衣阁自然村,因村内已湮灭的白衣庙而得名。这个乡政府所在地,人烟稠密,村街井然,也算乡间通衢了。

李文祥回乡的同时,一个战斗模范、特等功臣、少尉军官、18级干部已消于无形。村中老人依稀记得往他家送过立功喜报,但他不提便也淡忘。逢到乡亲问起打仗的事,他避开惨烈血腥只讲点片断。后辈们就只知道他是一个当兵的,一个老军人。

一切化有为无,这是李文祥重新开辟的一种人生、一种活法。千万人难以放下的,千万人难以做到的,他却自然而然放下了,一心一意做到了,这就是他的纯粹、他的非凡。21年后回故乡的,还是一个像泥土一样天然质朴的大地赤子。其实那个装满奖章奖状的小布包他很珍惜,妻子说留着有啥用?他郑重地说:“这是荣誉。”但他珍藏的方式便是消失。在他看来,能够证明存在价值的,能够体现理想信仰的,不是荣誉,不是地位,而是不断在干,永远在做。这个积极行动的勇者,这个掌握命运的强者,不随波逐流,不苟且偷安,每次选择都义无反顾,识大体,顾大局,从不考虑私利,甚至宁肯损失私利,只为遵循一个原则:响应党的号召,服从国家的需要,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。

37岁的李文祥融入了乡村男性精英之中,一回乡就当民兵连长,不久又当生产队长,满腔热忱地投入了生产建设。

然而,万万没有想到,一边是火红的建设激情,一边却是昏黑的居家日子。

老宅不大,容不下突然归来的夫妇。进家头两夜,只得露宿在院子里。父子兄弟分开过,陈宝珍在院角地上摆三块砖头,天天支个小平钢精锅烧柴做饭。

直到有一天,父亲把李文祥追到村街上大打出手!

李文祥转业在福建工资不低,那时把钱不当回事。曾把父亲接去生活,并为弟弟安排活计,可父亲和弟弟过不惯都回了家乡。几年间,家人频繁地迢迢来往,钱都抛在了路费和花销上。

现在大儿子回到身边了,父亲以为他还像当干部时一样宽裕,向他借钱不能如数满足,老人恼羞成怒,在大街上当众揪住他的头发,劈头盖脸一顿痛打。李文祥什么个性!什么身手!闪闪身子就能挣脱,但打他的是他亲爹啊!一分钱难倒英雄汉,这个民兵连长、生产队长,含着屈辱,任凭一记记老拳抡在头上,任凭一个个耳光扇在脸上,这是他为自己选择不当干部当农民付出的代价!……被乡亲们劝开以后,他回到屋里,泪水第一次在妻子面前倾泻,胸口憋得肺都要炸了,妻子连忙请医生打了一针才缓过气来。

你后悔当农民了吗?从这时起,人们一直问了他50年。

“后悔啥!革命分工不同,在哪儿都是为人民服务。”他的口气从来不软。

即使被严酷无奈的农村现实打得头破血流,他也无怨无悔,这不是个人行为,而是响应国家号召。从军人、保卫干事到一个农民,只要不顾个人得失,就没有落差。回到家乡干革命,是他钟情的选择。他开始了一场隐忍的战斗。

村中北街有座不大的关帝庙,人称老公庙,正堂做了“赤脚医生”诊所,前院是一片荒草空地。李文祥找到大队部要求:我住老公庙吧!乡下人惊讶地说:庙里是住神灵的,凡人哪降得住啊,那草里还有长虫!他说我啥都不怕,我敢住庙。

李文祥天不亮就起来满村去捡砖头;夫妻俩晚上为馒头坊帮工推磨,每天磨50斤面;闲时编稻草辫儿,盘10圈挣一两角钱……3间土屋终于在老公庙前院盖起来了,他们从老家搬迁出来。因为庙址在老8队,那里正盼一个好队长,李文祥转任老8队队长。直至如今,村民仍习惯称北街村这一块为老8队。

那时生产队干部没有任何补助,只是每天出工比社员多记一两个工分。李文祥一天记10分,陈宝珍一天记7分,这两个整劳力长年全勤,年终分红成了余粮户。实行家庭承包土地后,1983年又盖了3间西砖房,90年代还翻盖了堂屋3间砖瓦房。

当然,开始最难的还是27岁的福建女子陈宝珍。冬天她怕冷,在北方严寒中思念沿海侨乡郁郁葱葱的美丽。青黄不接时,连菜窝窝和红薯干都吃不饱。乡亲们听不懂闽南话,笑她“南蛮子”,她只好丈夫走哪儿跟哪儿。

“老李,忘了不跟你来了。”她委屈地哭起来。

记者问:当时你哭了,丈夫怎么劝你?

她看看身边的李文祥老人,笑道:“他说,你愿走你就走吧。”

真的如此无情?李文祥老人莞尔一笑,拖长声音说:“她走不了——!”

是啊,李文祥福气真大,眼力真准,找了个寒冷逼不走、贫穷赶不走、磨难吓不走的福建媳妇,患难与共,相依为命。她敬重他、信赖他、依从他,他的坚定引领着她的顽强,她的乐天补充着他的淡定,他们缺一不可,直至垂垂老矣。

陈宝珍早已融入了白衣阁的百丈红尘。她学会了范县方言,与乡亲们嬉笑怒骂,如鱼得水;她学会了耩麦子、点玉米、打农药;她学会了擀面条、蒸包子、包饺子;她学会了持家,最多时养6头猪,卖了600多元钱盖房;她学会了女工,织的花格床单比如今商店卖得很贵的老粗布还漂亮。因为特别勤劳能干,社员们选举她当了妇女队长,与当生产队长的丈夫一起夫唱妇随……如今77岁的老太太,一骗腿就上了三轮车,蹬起来像一阵风。

“现在我啥都会!”她笑靥如花地告诉记者。

李文祥老人疼爱地笑她:“你还会吃呢。”

陈宝珍对闽南话还听得懂,已说不好了。她常想回福建走娘家。1968年表姐去世,她卖一头猪81.60元,零头留给丈夫过年,独自回了一趟梅山镇。此后43年与亲戚失去了联系。今年年初,省委书记慰问后,她陪丈夫又出了两趟远门,一次是参加春节团拜会,一次是出席报告会。她总共只走出去3次——50年,3次。

黄河岸边这片广袤平原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,曾发生过晋楚“城濮之战”、齐魏“孙庞斗智”、五代“刘桥之战”。革命战争年代被称为华北“小延安”,邓小平、刘伯承、杨得志、万里、杨勇、宋任穷、段君毅等在这里指挥战斗,晋冀鲁豫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就在白衣阁村打麦场上召开,段君毅的老家就在村内东街。

在这片土地上,后又担任生产大队长的李文祥,火力点始终对准一个顽固的死敌:“我就不信,改变贫穷比打仗攻山头还难!”

他特别喜欢站在村口敲钟。那是一片挂在树上的旧铁犁铧,却每天发出乡村集结号。抬眼看看日头,该上工了,举起铁棍当地敲,钟声传遍全村,家家户户都能听到,社员荷锄扛锹从各个院落拥出来,一起走向田野集体劳动。他带领社员们,头年上了孟楼河挖河工地,第二年上了陈楼支渠挖渠工地,饿啃干粮,渴饮凉水,困了就和衣躺在河坡草地上,曾连续奋战40多天没进家。

1966年县里发展水稻,在南方见过种稻的李文祥,主动担任稻改队长,日夜蹲在稻田钻研种植技术。以往亩产小麦300来斤,种稻第一年就收了千把斤,男女老少捧着白花花的米大喜雀跃。只难为了做惯面食的炊妇们,大米干饭常常煮糊了锅。

丰收以后,李文祥坚持先向国家交公粮,再给社员分口粮。结果公粮交足,口粮够吃,不用再买统购粮了。虽然后来水道阻断,水稻只种了四五年,但黄河水改良了土壤,三四百亩盐碱地变成良田,如今小麦亩产可达千斤,群众生活逐渐富裕起来。

李文祥保存了一张1974年的奖状,当时正值“文革”,他却因三秋种麦贡献突出而获奖。

10年浩劫,乡村也在武斗夺权,附近的陈楼连土枪土炮都用上了。但老8队有李文祥这个主心骨,个别人兴风作浪也闹不起来。李文祥牢记公社武装部长的话:啥也别管,搞你的生产!

一天,社员匆匆来给李文祥报信,让他赶紧跑,造反派做了一块“打倒李文祥”的牌子,准备让他游街示众。他跑到了六七里外的傅亭村妹妹家。过了几天,有人来叫他回去,他说:“叫我回去游街吗?”来人说还让你去管稻子。

闹得最凶时,就在李文祥家附近的操场上,造反派给县长和书记挂黑牌子开批斗会,陪斗的还有许多干部。这时人们已十几天不见李文祥的踪影了。他守在稻田里,困了睡草庵,饿了就和几个社员烧嫩玉米棒子吃。他说:“打敌人咱去,斗自己人咱不去。”稻子抽穗时出了飞虫,幸亏他及时发现组织打农药,才保证了丰收。

现任村主任董明亮,常来李文祥老人家里串门儿,聊聊村中大事,听他出出点子。董明亮特别提到那一眼死而复活的机井。去冬今春,那场特大旱灾袭击中原,麦田浇不上水,眼看要大幅减产。当过多年生产队长的李文祥,知道村东北角那一眼机井水头最旺,可它已淤死成了废井。老人便自己拿出450元钱请人淘井,这眼机井又汩汩地喷出水来,周围的农田再也不愁干旱。

去年患脑血栓以后,老人还常常央求女儿:“你用三轮车驮我去地里喂,让我看看庄稼。”

(下转A15版)